

绪 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并取得成功，中国与海外华资互动程度的增强以及双方的成功合作，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对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问题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中外学者对这一课题关注较多，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通过剖析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发展演变，揭示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进程中的一些特征，以求能取得一些新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将近 3 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有 80% 居住在东南亚地区。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不仅人数众多，聚居程度高，而且华侨社会的形成较早，同祖籍国中国的关系也较密切。在历史上，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都曾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反应。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欧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并积极寻求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东南亚华人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质变，当地出生的华人人数远远超过来自中国的移民。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选择了与当地人民携手建设新兴国家的道路，成为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公民。东南亚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华商，在经历了东南亚国家学习工业化（由商转工）、限制华侨华人的经济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实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经济实力得到加强。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东南亚华商建立了大型企业集团并开始走向世界实施跨国经营战略。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也是以这五国的华人

企业集团为主。

1978 年以后,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东南亚华商提供了又一个大好的投资机会。进入 80 年代以后,东南亚地区形势日趋缓和。中国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政府也努力促使其国民经济加快发展,东南亚各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经济合作与交流也日益增多。而不论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成长过程中,还是在它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华人无疑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淡漠和隔绝之后,东南亚华人同祖籍国之间的亲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似乎正以经济活动为杠杆而重新得到加强,因此,人们对东南亚华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也日益产生了兴趣。

统计资料显示,1978—2001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3% 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 3 倍。200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0 万亿元。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8.1%。一个占世界总人口 1/5 的古老国度能够在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杰出贡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从 1980 年至 2000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GDP 的贡献率为 14% 仅次于美国(20.7%)^①。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从国外引进的资源、技术。从中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 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 截止到 2003 年 3 月底 全国累积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32 820 家,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8 510.42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4 610.52 亿美元^②。中国从 80 年代开始吸引外资,90 年代后进入迅速增长期。自 1993

① 何帆:《发展的中国经济有利于世界繁荣》,《求是》2003 年第 6 期。

② 《中国首季新批外企近 9000 家,使用外资 130 亿美元》,http://news.sohu.com/48/95/news208529548.shtml,2003 年 4 月 16 日。

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已连续 9 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 527.43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吸引外资进入了新局面。世界 500 强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近四百家，外企在全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分别占到 65% 和 80%，跨国公司成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催化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移师中国，建立了配套产业群，面向全球生产。2002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近 30%，占全国出口总值的 52%；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0%~15%，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25% 左右；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为 20%，在外企直接就业的人数就达 2300 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 10%^①。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商投资热潮不减，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现今，世界上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到中国投资兴业，而华商无疑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领头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大量外资的引入，但由于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差别，在经济体制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致使许多事情不易达成官方协议。此时，港台等地中小资本便利用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民间的网络，设法将资金、设备和技术引进内地，促进了中国台港地区和内地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华商也不甘落后，纷纷以香港为据点，利用华人商贸网络打入了中国内地市场。而那时，西方商人对投资中国是否明智存在很大疑虑。因为国门初开，条件优惠，竞争对手少，早期来中国投资的华商获利自然十分可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他们的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事业不断发展。他们的成功经验，有如一个样板，吸引更多的华商和西方公司前来中国投资发展。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华商在文化理念、语言习惯等方面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东南亚华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

^① 《527 亿美元外资怎样引入的？引向哪些领域》，<http://business.sohu.com/88/64/article205756488.shtml>, 2003 年 1 月 15 日。

许多有利条件，他们熟悉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有许多亲友协助他们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华商通过基于共同语言文化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治上和法规透明度上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额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与近代东南亚华侨投资中国所占的比重相比，相差甚远。近代华侨在大陆的投资主要以海外华侨（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为主，约占投资总额的 85%~90%^①。但是，东南亚华商的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先驱和催化剂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在华投资的成功经验，吸引了更多的华商和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西方国家财团投资，往往依靠华人介绍、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在华投资不仅带来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他们的投资也促进中国对经济法规、管理制度的改革，提高了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催生了一大批经营企业的人才，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海外华商提供了最可直接借鉴的形式和经验。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莱斯特·瑟罗也认为，海外华人对中国内地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外资，而且是教会了他们的民族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几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各国的财团纷纷在中国大陆投资兴业，以期在中国这个迅速发展的庞大市场争得一席之地。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更是利用自己的内在优势，纷纷涌向中国大陆投资。其时，在世界一些角落却发出了一种很不协调的声音，西方一些传媒在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对海外华人

①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5 页。

② 《华商——中国商业的粘合剂》，http://www.js.cei.gov.cn/huas-hang/hsdh_hli.htm，2001 年 9 月 4 日。

投资中国大陆也作了大量的别有用心渲染，说什么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依靠“爱国华商”、“他们回中国大陆投资不仅是为了单纯的商业往来，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归属感，更是投资的主因”等等。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被一些人不恰当地夸大了。东南亚国家一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也对当地华人投资中国提出种种非议，把对中国的投资与对当地国的效忠联系起来。不过，东南亚国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界领袖，却坚持正确的方针，肯定和鼓励当地华人到海外包括中国大陆投资，以利开拓国际市场。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国外资金、技术的合作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吸纳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外资，包括海外华人的资金。这些外资的实际投入和开展互利合作，对解决中国资金的不足，技术设备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解决中国的能源、交通、通讯等一些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对促进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只是起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而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遑论单单东南亚华人的投资了^①。也有的东南亚当地原住民企业家认为，身为东南亚国家公民到中国大陆投资，应该考虑能促进东南亚国家贸易的项目，只有这样才不会与东南亚本国的发展有抵触。东南亚华商要到中国投资，必须投资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有帮助和对东南亚国家进口中国产品有关的项目。

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稳定的政局、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优越的人力资本、廉价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对外国投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对于需要向外发展的东南亚华人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华人企业集团对我国投资十分踊跃。东南亚国家对华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是华人进行的，华侨华人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主体。另外许多东南亚华商因为种种原因不便直接前往中国投资，

^① 何殊：《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的动因》，《华侨与华人》1994年第1期。

而投资在香港则是完全正常与可以被接受的。因此,许多东南亚华商便透过香港在大陆投资。东南亚华人与香港关系非常密切,约数万人在香港经商^①。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东盟各国华人又掀起一股来中国投资的热潮。印尼三林集团(Salim Group)总裁林绍良(Soedono Salim)曾预测到2000年前夕,中国人均收入可达1000美元。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东南亚华人将不会让港商专美。东盟国家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为他们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华人经济的发展。正如泰国正大卜蜂(Charoen Pokphand, CP)集团总裁谢国民(Dhanin Chearvanont)先生所说:“中国开放政策会使中国越来越富,我在中国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富。”^②加上中国奉行对外开放与周边睦邻和平友好的基本国策,东南亚各国近年来对来华投资的公司财团采取鼓励或默许态度。在亚太地区华人资本向外流动的历史过程中,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及港澳台财团的友好合作将会带动侨、港、澳、台及西方资本汇合在一起,从而兴起寻找中国市场之投资热潮。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后来外商的大量涌入探了路,提供了经验。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到了许多优惠待遇,在促进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同时也壮大了自身的事业。

多年来东南亚华商投资于工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项目及一些夕阳产业较多,而投资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少,投资农业的比重更小。由于外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份额过重,加工贸易增值率低,从长期看对出口增长不利,也加剧了制造业的激烈竞争。而作为重要支柱产业如

① 王赓武:《华商文化的研究》,载刘宏主编《坦荡人生 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新泽西与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版,第156页。

② 杜家元:《浅析东盟国家华人经济发展的外因》,《华侨华人与侨务》1995年第4期。

建筑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只占该行业总值的 1% 作为发展市场潜力巨大的旅游业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合资企业；作为消费需求巨大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几乎为空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投在沿海地区，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90%。在 1992 年以前，东南亚华人的投资区域则明显相对集中于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其中，1997 年广东一个省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就占全国总量的 25.9%^①。外资对我国沿海沿江发展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这些区域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产生了约束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沿海地区外商投资项目雷同 相互竞争激烈 另一方面使得中西部人才、资金、技术向这些地区转移，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地区间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首要目的是追求商机和利润。如果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亏损，他们同其他国际资本一样也会撤出，但是，中国的投资政策十分明确，实施互惠互利的原则，再加上中国被世界投资家视为“世界上最后的一块热土”，因此先行一步的华商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既为华商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又有利于华商的所在国、所在地，也有利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又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商投资中国对中国经济发展居功甚伟，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已经成功地协助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发展经济。随着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中国将对亚太地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将会有重大发展。东南亚华商对中国人价值观和商业手法的熟悉，有助于东南亚所在国打通与华人社会的关系，使双方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人将成为其国家与中国发

① 胡鞍钢：《中国如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港澳经济》1999 年第 2 期。

展经济贸易和政治关系的最宝贵资产^①。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书力图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结合东南亚华商在所在国的发展历程与近代时期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归纳出东南亚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其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东南亚华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均起到了其他外商直接投资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东南亚华商的投资，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使中国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也促使了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法规法制上与国际接轨。在带动西方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中国方面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在中观层面上，东南亚华商的投资，在一些行业、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侨乡地区，直接带动了这些行业、地区的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在微观层面上，东南亚华商投资企业成功经营的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企业可以直接有效地吸收借鉴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在沿海侨乡地区，催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东南亚华商投资企业也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企业生产经营人才，对国民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东南亚华人本身在东南亚地区处于微妙的地位，因此他们很多投资中国的行为是通过香港进行的。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投资已有一定的历史与规模，而且，香港是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的基地与桥头堡。另外，东南亚华人资本也往往与东南亚其他资本、港澳台资本、西方资本联合向中国进行投资。

^① 王赓武：《华人企业家及其文化策略》、《投资中国热潮遍及全球——东南亚华人仅亦步亦趋》，载刘宏主编《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第 166 页、第 172 页。

东南亚华商的投资，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集中于沿海地区。中国政府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也考虑到了发挥东南亚华人的重要作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经济特区、沿海地区、沿海侨乡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为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沿海地区活跃着一大批富有生机的民营企业。

另外 东南亚华商的投资企业 不仅带来了资金、设备、技术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一大批民营顺势而生，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向它们学习、与它们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国企业实力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大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双向投资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东南亚华商无疑可以起到桥梁作用。

总之，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东南亚华人经济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与中国大陆成功的经济合作。东南亚华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自身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加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友好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关系。

有关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的命题，涉及多种学科理论。本书试图运用以下理论方法，阐述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产生的原因、发展状况，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影响。

经济学 / 管理学理论：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中国的一部分，但由于华人与中国的特殊渊源关系，又有其专门特点。而且伴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东南亚华人一直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可视为西方

资本在中国投资的先驱。东南亚华商在华投资的投资乘数效应^①、杠杆效应、经营管理‘溢出’效应等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大型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也被学界视为后起的跨国公司，它们在中国的投资也适用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此外东南亚华商在引进资金、设备、技术的同时，经营管理理念的引进、国际市场惯例的导入，都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东南亚华人企业家族经营模式的演变也对中国的民营企业起到了启迪作用。

人类学 / 社会学理论：布罗岱尔的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理论。在东南亚华商在改革开放早期，较集中投资于其故乡，表现得较为明显。其语言、文化、亲缘等方面的优势，与西方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相比，体现了其“比较优势”。特别是华人中小资本的投资，更仰仗于这种优势的发挥。早期中国投资环境不规范，海外华人在家乡的人脉关系网络对改善投资企业的软环境有很大的帮助。因而东南亚各国华商在早期的试探性投资时期，其投资地区分布与其籍贯分布呈现出正相关。相对于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的投资者，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同文同种、风俗习惯相似而易于沟通的人文优势，“华人关系”成为可能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族群资源，对追求投资利益的最大化有帮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区和产业领域的扩大，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东南亚华商对大陆的投资区域日益向祖籍地之外投资环境更好的地区发展。因为在这些地区，东南亚华人企业同样能充分利用“华人关系”的资源来追求投资利益。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比其他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也比他们投资别的国家更具优势。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也更容易转化为经济资本。

国际关系学 / 国际政治学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外交工

为引进外资和“三来一补”业务，内地必须先进行厂房等基础设施投资或腾出原有企业及生产工序。一般推算每引进 1 美元外资至少需要 4 元人民币配套。参见罗晓京：《港商到内地投资经济动因浅析》，《华侨与华人》1988 年第 1 期。

作取得重大突破，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已经形成。1990 年我国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建交；1991 年与文莱建交；中泰关系持续友好；中马关系发展突飞猛进；中越、中菲关系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入 1949 年以来最好、最稳定的时期。国家关系良好，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区域经济合作营造了较好的政治氛围。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东移至亚太地区，东南亚各国政府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将地缘经济的信念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努力同邻近的亚洲大国——中国建立更加广泛的贸易、投资、金融关系。除了由政府首脑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来华洽谈双边经济关系之外，新、马、泰政府还倡导该国的华商利用同文同种的便利条件充当对华投资的先行者，从而使华商解除了心理包袱。东南亚国家的默许与支持、华人的自律，以及中国政府的采取的明智政策，使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得以健康发展。

历史学 / 地缘学理论：通过近代东南亚华侨商人投资于中国民族工业，与现今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投资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同时也考察东南亚各国华商在华投资地域、行业等分布的不同特点，进行横向比较，来综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特点。另外，东南亚华商较集中投资于中国沿海地区，使得华南、长江流域东北地区成为接受国际经济、信息技术等的最佳中介区域。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依然是清代、甚至是明代那些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

在统计资料的应用上，由于中国外经贸部门历年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按国家地区来划分的，东南亚华商投资的金额未另行统计公布，因此要得到准确的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金额尚有困难。不过，东南亚华商是东南亚国家投资中国的主体，则是确定无疑的。另外不少东南亚华商出于政治、种族等因素的考虑，通过其在香港的全资附属子公司对中国投资，因此一些东南亚华人资本融合于港澳资本之中，而这类投资在中国公布的数据上通常归入香港投资一栏。本书在涉及具体的投资项目时，尽可能把东南亚华人资本与其他资

本区分开来。

三、国内外研究评介

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再加上东南亚华人经济自身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东南亚华商与中国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该课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早于 1988 年出版的专著《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对近代华侨在中国的投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的撰写工作是建立在对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近五十个市县的广泛调查基础上，掌握了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强。许多论点和论据，如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金额总数、华侨投资占民族资本的比重、华侨投资占侨汇的比重等等，皆系首见。作者在宏观上就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发展变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基本情况、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悲惨命运等问题，都作了较系统地概括和全面地分析，提出了一些以前未曾提出的观点和见解。同时，作者对问题的论述，既注意纵向方面研究，也注意横向方面的研究（如同一个时期不同华侨投资额、投资行业不同的比较等），使人们能了解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基本轮廓。作者对华侨投资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进行分析，做出了较客观地评价。这对当今鼓励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以及外商来华投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①。此后，林金枝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②。

^①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详见林金枝：《外商（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势（1979—1992 年）》，《华侨与华人》1992 年第 2 期；林金枝：《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在福建的投资》（上、下），《华侨华人与侨务》1994 年第 2 期、1995 年第 1 期。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的动机问题，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颜清湟认为，东南亚的华人投资者，不论他们对祖国怀有多强烈的感情，如果他们没有获利的机会，也不会把自己的资本冒险放在中国投资。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动机，是以利润和市场的巨大潜力为前提。作为深谙中国语言的投资者，他们会感到自己比其他投资者更具有竞争条件。惧怕东南亚华人在中国投资会牺牲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是毫无根据的^①。新加坡国立大学廖建裕博士也认为，东南亚华人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多与商业契机与利润有关。不仅是华裔，就连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都始终寻求在中国投资。虽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商人占有通晓华语（但并非东南亚所有华人皆会说、读中文）的优势，也可能在中国拥有他们的社会网络。但我们应质疑的是如下一项有偏差的假设：即华裔基于此一事实总是在政治上倾向中国且在中国投资。尽管世界各地的华人商人、领导者及学术人士之间有日益增多的网络，但世界各地的华人不会形成单一社群。东南亚国家亦未形成东南亚华人社群，因为东南亚华人都认同他们各自的国家，并不自认为属于一个共同较广大的东南亚华人社群^②。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则认为，尽管对绝大部分海外华商而言，投资盈利始终是主要目的。但也不可否认，海外华人的家乡情结也是投资家乡的动机之一，当然，即使是家乡情结，也反映出功利色彩。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政策还不规范，对投资环境的熟悉也需要时间和过程，利用祖籍地省份相对较多的人脉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华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对东南亚五国华商来说，由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具体每个国家的华商的情况也不完全一致。尽管新马华人在华投资数量较大，但在祖籍地投资数量比例并不大，反

① 颜清湟：《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延续与变革》（马）《星洲日报》1999年10月15日。

② 陈志明：《评廖建裕的论文：东南亚华人？华侨？海外华人？或东南亚人》，《星洲日报》，1998年4月8日。

映出新马在华投资的动机较少有祖籍地因素。新加坡华人投资中国初期,广东和福建是其投资的主要地区,但是,新加坡华人的投资集中于能享受较多优惠政策的闽粤沿海开放城市,尤其是两省内的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而非在其县乡的祖籍地。1992年以后,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对外资的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福建和广东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新加坡对华投资分布的区域也发生明显变化,更多地往劳力、地价较便宜的内陆省份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和华北地区发展。而马来西亚华裔在投资中国早期,为了避免敏感问题,有意识地选择先北后南的投资方式。但是,菲律宾华裔在华投资则高度集中在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反映出菲律宾华人在华投资的强烈家乡情结。印尼华人的对华投资,也较集中于祖籍地福建,主要通过香港的子公司进行,而且,其在福建的投资大多集中于其家乡县市。印尼林绍良集团、蔡云辉(Tjoa Eng Hoei)集团等在其家乡福清市创立大规模的工业区,先后投资达数亿美元。最能说明印尼华人对华投资的家乡情结的典型是印尼李文正(Mochtar Riady)集团。其旗下香港力宝集团在李文正的家乡莆田湄州岛、忠门岛投资长期开发项目,包括发电厂、港口、工业区等大型项目。李文正曾说“就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而言,相对于莆田,上海是更好的投资地区……但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名声,福建是我的祖籍地”^①。泰国华人在中国的投资也相对集中于广东省和海南省,尤其是他们的祖籍地潮汕地区^②。

①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 123.

② 对于东南亚华裔投资的动机问题,详见庄国土:《利益或情感驱动?从新马华人对福建的投资看 1978 年以来新马华人与祖籍地的联系》,载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002 年版,第 295~316 页。庄国土:《从菲律宾华人对福建晋江、厦门和南安的教育捐赠看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社会纽带》,载柯丽莎、刘宏主编《中国与东南亚:社会文化之互动及其变迁》,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2 年版,第 123~134 页。

关于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的规模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饶美蛟教授认为，中国自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1986 年前东盟华商投资大陆的并不多，随后则渐渐增多。自 1979 年至 1991 年，海外华人资本投向中国的不过 15 亿美元，1992 年则比过去 12 年增加了一倍（与整个外资增长比例相同）。但此数额仅占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 5% 左右，远比港商、台商的投资少得多。海外华人到华投资主要是追求利润，是一种经济行为。中国大陆宣传所说的“回乡建设”不是没有，但只局限于极少数地区。我们很难想象，大投资者会不考虑投资利润。事实上，东盟华商到大陆投资，是其企业国际化的一部分，大陆提供一个良好的赚钱机会，为何不去？为了消除东南亚非华裔居民的猜疑，在讨论海外华人到大陆投资时，别再用“回乡建设”等刺激性字眼，它既无益亦无建设性。

澳大利亚华人问题专家乔治·希克斯和麦基在 1994 年 7 月 14 日《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中认为，严格的调研结果表明，来自东南亚的对华投资比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要少得多。尽管东南亚在华投资的准确数字难以获得，但一般公认的数额约为 80 亿美元。而来自香港的投资额约为 400 亿美元，来自台湾的则有 54 亿美元。在广东和福建的大多数东南亚投资者似乎只是作一些投石问路式的试验性投资，并且通常投在其祖居地，这样做便于他们利用其在当地的亲戚关系以及对于风土人情的了解^②。这也可以认为是东南亚华商将他们的“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所做的一种努力。

菲律宾菲中资源发展中心研究人员王彦博在该中心主编的 *China Currents* 双月刊上发表的论文《菲律宾对华人投资中国的反应》中认为，中国为了吸引海外华人资本并以之作为除日、美、西欧投

（港）《华侨日报》1994 年 7 月 12 日。

② George Hicks and J. A. C. Mackie, "A Question Of Identity", *Far-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57, No. 28, July 14, 1994, pp. 46~48.

资以外的一种选择，在海外华人主要祖籍省份设立经济特区，提供优惠措施。东南亚华人资本家和企业家反应尤其热烈。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东南亚地区投资到中国的金额，每年达 10 亿~20 亿美元。此后，西方国家资金流入激增。1992 年 1 月至 1993 年 6 月，中国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资本家达成的协议金额达 159 亿美元，涉及 22 个项目。菲律宾华人在 1992 年 6 月至 1993 年间对中国的投资估计达 1.25 亿美元。这个地区的许多政客和官僚对东南亚的国内资本大量外流极其警惕。例如，印尼政府就对当地华人把资本输出中国表示关切。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公开说，如果马来西亚华人的投资继续转向中国，他们的忠诚可能成为疑问。菲律宾华人对中国最早的投资是在 80 年代初，但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当时还未发展到足以向投资者给予优厚的回报，所以那时投资中国者非常有限，为了避开菲律宾政府的严密检查，这些投资大部分是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进行的。80 年代末，参与中国投资的人有：郑龙溪、陈永栽 (Lucio C. Tan)、黄呈辉、施至成 (Henry Sy)、郑周敏 (Tan Yu) 集团、吴奕辉 (John L. Gokongwei Jr.)、郑少坚 (George S. K. Ty)、姚祖烈 (Jose Yao Campos) 等资本家。此外，也有华人中小企业家向中国投资，他们投资的项目大多数是在福建、广东和上海等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福建 (80% 菲律宾华人的祖籍省份) 是最受菲律宾华人欢迎的地方。通过调查表明，尽管菲律宾人对菲律宾华人投资中国心存疑虑，但多数人还是毫无偏见地认为，由于这个少数民族卷入中国，使得拥有 12 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市场向菲律宾开放，因而对菲律宾还是有巨大经济利益的。他们同中国的文化亲缘和经济联系，菲律宾民族承认并加以利用，作为国家利益的一种自然资源^①。

Rajeswary Ampalavanar-Brown 以泰国正大卜蜂集团在中国的

^① 王彦博著、黄滋生译：《菲律宾人对华人投资中国的反应》，《侨务工作研究》1995 年第 6 期。

投资为个案，分析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状况。与其他东南亚华商投资企业相比，正大集团的投资遍布全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祖籍地。其投资的行业也非常广泛，除饲料行业外，还投资于摩托车、机械、卫星电视、能源和通信等等。截止到 1995 年，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就已达 50 亿美元。经过对比分析，作者认为，与西方公司相比，华人企业集团投资中国具有热中于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但实际到资率较低等特点^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认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数目并不那么大，数目最大的是香港和台湾。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南亚华人投资中国，常常是跟他们国家政府有联络的，不完全是自己到中国去。换句话说，他们表示他们是当地的公民，了解当地的需要，了解他们的投资对当地的经济有直接的帮助，他们的政府会高兴，并同意他们到中国投资。把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关系建设得更加好，对将来整个东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这不是为了华入社会而投资，是为了整个东南亚社会的需要，贸易上的需要^②。另外由于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和香港的作用以及东南亚华人企业的贡献，导致了“大中国”一词的各种用法。这一术语听起来多少带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一方面是沙文主义者的骄傲，另一方面是区域民族主义者的惊慌，两种极端的观点日益引人注目，现在迫切需要学者们做出努力来驳斥这种极端主义并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③。所谓投资指的是为了盈利而进行的商业投资。今天，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企业家和商业主管，自然把资金投在本地的工业和发展事业上。他们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受到鼓励，把资

① Rajeswary Ampalavanar-Brown,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Patterns of Growth, Diversification and Finance: The Case of Charoen Pokphan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5, Sep. 1998, pp. 610~636.

② (新)《早报周刊》1996 年 8 月 25 日。

③ 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6 页。